

西…域…文…明…探…秘

贾建飞 著

文明之劫

——近代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

*Modern Cultural
Relics Outflow of
Northwest China*

45

0

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一輯 中國文化史

第 10 卷

文明之劫

近代中國南遷北歸的浮世

Jonathan Goldblatt

Robert Chapple of

Northwestern China



K872.45

J240

Modern Cultural
Relics Outflow
of Northwest China

文 明 之 劫

——近代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

贾建飞 [著]

2A292/5

人民艺术出版社

6271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之劫——近代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 / 贾建飞著.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4

(西域文明探秘 / 余太山主编)

ISBN 7-102-02956-X

I、文… II、贾… III、文物—研究—新疆—近代
IV、K87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831 号

文明之劫——近代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

贾建飞 著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 版: 北京燕泰彩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3.75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102-02956-X

定 价: 25.00 元

前言

“西域”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核心则是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西域一度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的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连接百国千城，肩负着送往迎来的重任。形式各异的民间和官方商贸、朝贡活动，使地中海文明与东亚、南亚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由于北方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时纵横驰骋，南下牧马，草原文明也随着金戈铁骑涌入这里。西域于是成了古典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多元文明的荟萃融合，使之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独特风貌。

西域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民族的多元性、语言的多样性，使西域研究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民族、民俗、艺术、宗教、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遗传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门难度很高的综合性学科。正因为具备殷实充足的内涵，拥有神秘奇美的色彩，艰辛困苦的探索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惊喜，使西域研究反而充满牵魂动魄的巨大魅力，吸引了大批学者甘为之衣带渐宽，九死不悔。这套丛书就是这样的一些学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

季羨林先生多次说过：“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交流给古老的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常新长盛，生生不息。交流满足了人类好奇的天性。人类的好奇心将永远跨越千山万水，对遥不可及的彼岸倾心向往，研寻不已。

西域研究就象是为人类好奇心打开的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中国人经过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去了解关外的奇异世界；大秦、黎轩、波斯、粟特的使团、商队则穿过浩瀚的沙漠纷至沓来，让古代中国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东与西的交流因之而成为可能。

可以说，西域研究开凿了一条时空隧道，让我们能够沿之前往寻觅、触摸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轨迹。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研究者和读者一起感受西域历史文化的绮丽壮美，分享上下求索、神游千年的快乐。通过这窗口，象牙塔内的工作更广泛地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同时，我们也热切盼望感受 and 了解使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投身到西域研究中来。

余太山

2004年5月21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鲍尔写本”的发现及其影响	1
第一节 19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在新疆的探险与寻宝活动	2
第二节 达格利什的遇害及“鲍尔写本”的发现与解读	5
第三节 新疆文物外流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9
第二章 新疆考古时代的到来	27
第一节 国际中亚考察协会的成立	27
第二节 斯坦因在新疆的考古活动	30
第三节 其他国家在新疆的考古活动	56
第三章 中国的反抗活动	86
第一节 华尔纳的中亚考察及中国的反抗浪潮	86
第二节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成立与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	93
第三节 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	102
主要参考书目	110

第一章 “鲍尔写本”的发现及其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西北[本文所涉地域仅为新疆，后文中所言中亚也主要指新疆。不过因行文所需，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也涉及到了甘肃、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在此特别指出]文物的大规模外流使无数稀世珍宝流落海外，分散于欧、美、亚洲十余个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及个人的手中。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中国长期积弱、备受欺辱而叹息愤慨，扼腕之余，也一直在为那些流落海外的珍宝有朝一日能够回归祖国怀抱而不断努力。

近代西北文物的外流，其实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是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渗透而出现的。

这一大规模的文物外流，乃源于著名的“鲍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s)的发现。所谓“鲍尔写本”，乃指英属印度的鲍尔(Hamilton Bower)中尉在新疆库车发现的一组有关古代印度文明的文书。这些文书是在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下被偶然发现的——彼时鲍尔正在调查1888年发生的近代中亚探险家、英国人安德鲁·达格利什(Andrew Dagleish)在新疆的被杀案。这一事件对近代新疆产生的影响是无穷的，正如西方人所言：“这次杀害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促使开辟一个从事地理探索活动的新时期，改变了此后20年间探索活动的重点”[[美]J.A.达波斯：《新疆探索史》，中译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76年]。由此，西方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片亚洲的腹地，以图在那里能够寻觅已经逝去的历史与文明。



第一节 19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在新疆的探险与觅宝活动

新疆地处东亚、南亚和西亚几大文明交汇之处，又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贯通中西，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俄两国向中国渗透扩张的主要目标。同时，新疆璀璨的文明也渐为外人所知，尤其是那些得益于新疆天然的干燥环境、未被自然与人为灾害侵蚀而最终保存下来的古代佛教文明更是吸引了众多西方人的关注[在新疆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新疆的佛教文明曾遭到了伊斯兰文明毁灭性的打击。此外，诸如战争、盗墓等也对新疆古代的文明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因此，对文物的搜集也逐渐成为他们的目的之一，这就使新疆的文明遭到了一次次的磨难与浩劫。大量的文物流离失所，飘落异域。对于那些掠取文物的人，人们称他们为“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英国人彼得·霍普科克(Peter Hopkirk)的一部著作即取名为《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1980年出版于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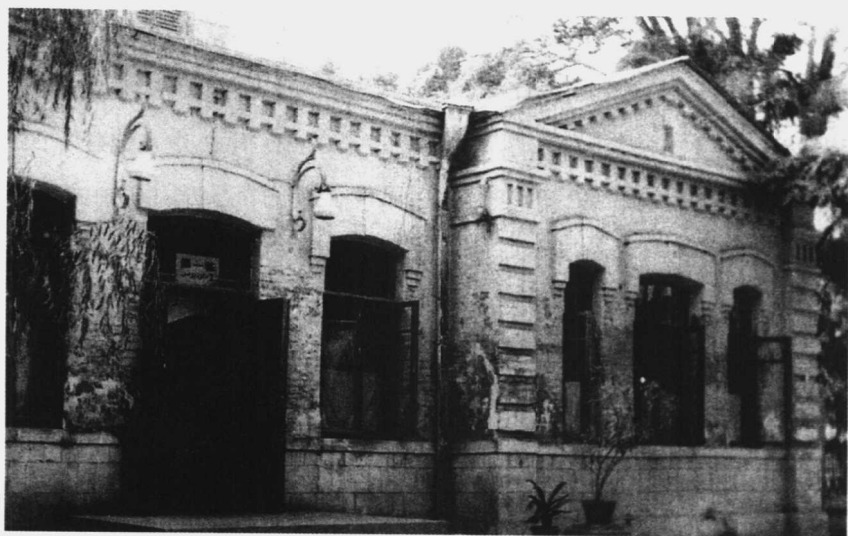
曾于1811年进入伊犁的俄国人普金舍夫是19世纪到达新疆的西方人中第一人。莫尔克罗夫特(W. Moorcroft)则是最早计划涉足新疆的英国人，但他的计划没有成功，只是在1819年到过喀喇昆仑山以北的地区。不过，他根据道听途说而写的《和田观察记》(Notice on Khotan)则是今天我们所知的西方世界关于南疆的最早报道。有记载的第一个真正进入新疆的英国人是汤普森(Thompson)，他于1848年进入新疆。

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人自由进入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经商等，加之此时新疆局势一片混乱，英俄两国人员借机开始一批批地进入新疆。

1862年，英属印度派遣穆罕默德·哈米德(Mohamed-i-Hameed)进

入新疆，在那里进行了六个月的秘密测绘活动。1865年，英属印度测量员威廉·约翰逊（W. Johnson）受当时和田统治者虎必不拉汗的邀请来到和田，沿途进行了一些测量活动，并绘制了一幅地图。他是19世纪第一个到达和田的欧洲人。他还调查了穆罕默德·哈米德的考察报告，报告中谈到了在南疆的沙漠中埋藏着古物。这成了英国收藏新疆文物的先驱。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即阿古柏叛乱期间，英国还有福赛斯（Thomas Douglas Forsyth）和罗伯特·肖（Robert Barkley Shaw）等人到过南疆，从事了搜集情报、文物以及测量地形等方面的活动。其中，福赛斯率团曾于1874年在英吉沙进行了英国在新疆的第一次考古活动，这也是新疆建省（1884年）前最大的一次考古活动，发现了两枚钱币，一些玻璃、陶器和铜器的碎片等，第一次将新疆文物带回了英国。回印度后，此次在新疆的发现汇编为《福赛斯爵士率领的使团于1873年出使叶尔羌的报告（附有关叶尔羌艾米尔占领地的历史和地理情况）》一书，福赛斯任主编。1876年，他在英国宣读了论文《关于戈壁大沙漠的流沙中埋藏的城市》，1877年发表于《皇家地理学刊》。此前，尚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名称，统称为戈壁沙漠（Gobi Desert），福赛斯在他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塔克拉玛干的名称。而罗伯特·肖则曾先后三次来到南疆。1875年，他受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出任驻阿古柏伪政权的所谓“公使”，第三次来到南疆。此行他还接受了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委托，在新疆考察文物，尤其是古钱币，这证明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此时已将目光瞄向了新疆。

1885年，英国人凯利（A. Caley）在达格利什的陪同下绕行塔克拉玛干一周，考察了南疆的大部分地区。而达格利什在1888年的一次旅行中被杀，在缉拿凶手的过程中，鲍尔在库车购买了后来轰动世界的“鲍尔写本”，从而引发西方各国对新疆文物的大规模搜集活动，导致中亚考察进入一个新的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住所

时期。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奈伊·伊里亚斯（N. Elias）和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等也对南疆进行了考察，但其成果并未超出凯利。不过荣赫鹏在1890年建立了阿古柏叛乱后英国在新疆的第一个据点，即英属印度政府驻喀什噶尔的政治代表处，其首任负责人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90~1918年先后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领事和首任总领事）在这里一直为英国工作了28年。

俄国方面，19世纪60年代主要有奥斯腾·扎根（Osten Zacken）男爵率领的考察队对天山地区的考察。1870~1885年间，俄国陆军上尉普尔热瓦斯基（N. Przhevalsky，后曾任俄军将军）先后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四次考察，涉及蒙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宁夏等地，跨考古学、生物学、人种学、地理学等学科，其考察范围之广、取得成果之丰富可谓前所未有，因此他得以与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国的斯坦因（Aurel Stein）并称为近代中亚考察三巨头。普尔热瓦斯基是西方人

中到达罗布泊和塔里木河下游并对罗布泊进行全面考察的第一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到新疆进行考察的较为重要的人物还有李盖尔 [Regel, 1876~1877年、1879年两次考察]、波塔宁 [Potanin, 1876~1877年、1879年、1884~1886年三次考察]、格罗姆切夫斯基 [Gromchevsky, 1885年、1889~1890年两次考察] 等。另外，在1888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曾计划进行其第五次中亚考察，但途中病死，考察队后来分成几队继续对南疆和西藏北部进行了考察，此次考察于1891年结束。

俄国对新疆文物的搜集始于俄国建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1882年)后，其首任总领事彼德洛夫斯基 (N. Petrovsky) 为俄国搜集了大量的文物。

但总的来说，19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对新疆文物的搜集尚未形成规模，新疆文物的大规模外流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

第二节 达格利什的遇害及“鲍尔写本”的发现与解读

一、“鲍尔写本”的发现

其实在“鲍尔写本”发现之前，甚至是在西方人来到新疆之前，中国的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过库车的出土文献。如19世纪初曾流放新疆的祁韵士在其《西陲竹枝词》中题为《库车》的一首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轮回经写唐人笔，佛洞穹隆石壁奇”，说的就是库车出土的唐人写经。但这些写经在当时只是作为书法作品而被士大夫们赏玩，并没有人留意它们的学术价值，更不可能因此而有意去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真正引起西方人关注并导致新疆文物大规模外流的，还是“鲍尔写本”的发现。

“鲍尔写本”的发现源于近代新疆的寻宝活动。而它能为西方人所知并落入鲍尔之手则与达格利什被杀有着一定的关联。



苏格兰人达格利什是著名的中亚探险家。1885年定居于叶尔羌，从事到列城的贩运活动。1888年3月底，他随一商队从列城返回，途中商队加入一个躲债的阿富汗人达德·马合木（Dad Mahomed）。4月8日，商队在经过喀喇昆仑山一处荒凉隘口时，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马合木杀死达格利什，随后逃走，下落不明。

达格利什被杀后，叶尔羌的英国人纷纷要求缉拿凶手。此时，英属印度的鲍尔中尉正在休假期间，他约了好友坎伯兰（W. B. Cumberland）少校到帕米尔打猎。1889年11月，他们到达叶尔羌。在此逗留期间，一位信使给鲍尔带来了英国驻列城联合专员拉姆塞（Ramsay）上校的秘令，让他在新疆设法逮捕马合木，信中还告诉他马合木可能逃往阿克苏一带。鲍尔于是组成三组搜寻队：一组前往阿富汗的巴尔赫和马扎里沙里夫；一组前往撒马尔罕；鲍尔本人则前往阿克苏和库车。在库车期间，偶有一天，一位维吾尔族人告诉他附近地下有一座古城，还说他有位朋友曾前往搜寻，发现一批古文书，这批文书后来落入库车的哈吉手中，而一个穆斯林鉴赏家古兰·喀迪尔·汗（Ghulām Qādir Khān）从哈吉那里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鲍尔遂从古兰·喀迪尔·汗处借阅这些文书，发现它由桦皮制成，上书梵文，并以两块木板夹装。鲍尔观后大为惊讶，便在那位维吾尔族人的带领下来到这座古城，但他在这里只见到许多建筑物的残毁痕迹，收获甚微。鲍尔于是从古兰·喀迪尔·汗手中买下了其中的51片桦皮页。有此收获的鲍尔喜出望外，也顾不得亲自缉拿马合木，很快便返回印度。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这里蕴藏着一个极为惊人的秘密，而他也必将因此而名扬世界。

至于马合木，后来他在撒马尔罕被地方当局逮捕。不过在等待引渡时，自杀身亡。

对于“鲍尔写本”的发现地，鲍尔曾提到是在库车以西16英里(约25744米)的一个地下城附近，这个地方实际是库车库木土拉石窟对面的一个罕堵波(stūpa，佛塔)，今天已经不见。

1895年，鲍尔发表他的游记《去往突厥斯坦一游》，记录了他获得这些写本的过程。

二、“鲍尔写本”的解读

1890年9月15日，鲍尔给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长沃特豪斯(J. Waterhouse)上校写信，告知他找到了一些古写本和古钱币。当年11月5日，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召开月会，第一次将写本展示，但却无人能识别“鲍尔写本”的文字。不过他们得出结论：“鲍尔写本”的文字字母大多与古藏文所来源的尼瓦尔文字有关，在新疆和田及和田以北地区应有大量梵语佛典。此后，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将“鲍尔写本”中的两个桦皮页拍成照片，发表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上。

当时，惟一有可能解读“鲍尔写本”文字的英国人是霍尔宁(A. F. Rudolf Hoernle)，但此时他正在英国休假。霍尔宁直到在结束休假返回印度的路途中，才从报纸上了解到“鲍尔写本”发现的消息。1891年2月，他回到印度后，从沃特豪斯那里得到了“鲍尔写本”，开始对其进行解读，而结果令他极为震惊。1891年4月1日，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月会上，他就“鲍尔写本”的解读工作发表讲演，指出“鲍尔写本”所使用的语言是梵语，内容共分三部分，其一为医书，书名《纳瓦尼塔卡》(Navanitaka)，其二是谚语，其三是咒语。而尤为轰动的是关于“鲍尔写本”年代的判断，他认为“鲍尔写本”的年代不晚于公元5世纪末。由于此前在印度发现的最早的书是公元6世纪中叶到6世纪末，因此，如果霍尔宁的观点能够得以证实，



那么“鲍尔写本”就必将成为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用印度文字写成的书，而这对其发现地新疆的意义自然将极不寻常。

就在霍尔宁对“鲍尔写本”进行解读的同时，维也纳大学教授、德国人比累尔(Bühler)根据发表的那两幅照片也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并于1891年7月发表研究结果。他与霍尔宁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即鲍尔写本的年代不晚于公元5世纪末。

1891年，霍尔宁正式发表第一篇研究成果——《论“鲍尔写本”的断代》，文中第一次将此写本命名为“鲍尔写本”。他的主要结论是：“鲍尔写本”至少由五个部分组成；“鲍尔写本”的年代应在公元400年左右到500年之间。1892年，他又发表《关于“鲍尔写本”断代问题的札记》，将“鲍尔写本”的年代进一步确定在公元350年到500年之间，具体而言，就是“鲍尔写本”中的医书部分约在公元450年前后，其余的在公元400年前后。1892年，霍尔宁先后发表文章，将该语部分定为赌博时所用的语言，而咒语部分则属咒语集。

此后，霍尔宁对“鲍尔写本”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刊布，将其重新划分为七个部分，前三部分为医书，第四、五部分为占卜书，第六、七部分为咒语。新的研究成果分别于1893年、1894~1895年和1897年刊布。至此，霍尔宁完成了全部“鲍尔写本”的刊布工作。

三、“鲍尔写本”的出版与收藏

直到1908年，霍尔宁才完成了“鲍尔写本”的全部梵语系列的研究工作。1912年，“鲍尔写本”的集大成研究成果《鲍尔写本（影印图版·那迦利字释录·罗马字母转写·附注英译）》作为1912年“新帝国丛书”的第22卷出版。它标志着霍尔宁对鲍尔写本长达21年的解读刊布工作圆满完成。

1897年,霍尔宁完成整个“鲍尔写本”的刊布后,将“鲍尔写本”归还给了鲍尔,鲍尔于1898年4月将其带回英国,卖给了剑桥的一个书店。1900年到1902年间,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Oxford)馆长尼克尔森(E. W. B. Nicholson)受霍尔宁怂恿,用50英镑将“鲍尔写本”买下,将其收藏于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第三节 新疆文物外流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鲍尔写本”的发现与解读立即引起欧洲东方学界(尤其是印度学学界)的极大关注。他们认识到,在遥远的亚洲腹地——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气候条件,可能存在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度语言写本,而这对探索印度的文明和历史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正如后人所言,鲍尔的这次旅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激起人们的好奇”,霍尔宁亦称“‘鲍尔写本’的发现及其在加尔各答的公布,开创了东突厥斯坦(即南疆)考古学探险的全新的现代化运动”,另一个学者也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不无夸张地说“整个科学的欧洲都开始在这个地区寻求更进一步的古物”。因此,“鲍尔写本”的发现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此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把目光瞄向这里,他们接踵而来,纷纷涌入新疆进行考察。在这种形势下,19世纪90年代成为令国人心痛的新疆文物外流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一、其余库车文书的发现

“鲍尔写本”只是在库车发现的文书的一部分,这些文书统称为“库车文书”。除“鲍尔写本”外,其他比较重要的“库车文书”还有英国的“韦



伯写本”(Weber Manuscripts),俄国的“彼德洛夫斯基写本”(Petrovsky Manuscripts),以及后来陆续落入霍尔宁手中的“马继业写本”(Macartney Manuscripts)的一部分和“戈特福雷写本”(Godfrey Manuscripts)的一部分(对“马继业写本”和“戈特福雷写本”将放在“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部分中加以介绍)。

(一) 韦伯写本

韦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德国基督教摩拉维亚教派曾派很多人到克什米尔传教。1890年6月至8月,鲍尔回到列城时曾让韦伯观看“鲍尔写本”,这引起了韦伯的极大兴趣,产生了搜集中亚文物的想法。而此时,曾卖给鲍尔那些桦皮页子的古兰·喀迪尔·汗随后将他所掌握的其余部分送给了他在叶尔羌的弟弟迪尔达尔·汗(Dildar Khan),后者于1891年带着这些文书去列城,将其中的一部分给了任职于英国驻拉达克政府机构的蒙施·阿赫马德·丁(Munshi Ahmad Din),阿赫马德·丁于1892年6月前后又将这些写本转送给韦伯,韦伯随后将这些写本寄给霍尔宁,后来它们被霍尔宁定名为“韦伯写本”。1892年6月21日和1892年7月29日,韦伯曾给霍尔宁写了两封信,第一封讲述了“韦伯写本”发现的背景,他根据一封用乌尔都语(巴基斯坦语)写成的信大致得知写本也是在库车附近发现的。第二封信则讲述了这些写本为一个阿富汗人发现。

霍尔宁在考察了这些写本后,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1893年卷)发表文章《“韦伯写本”——另一个来自中亚的古代写本搜集品》。文中讲明“韦伯写本”共有76个页子,它包括9件不同写本的混合体。和“鲍尔写本”最大的不同在于“韦伯写本”不是写于桦皮上,而是全部写在纸上。文字是婆罗谜字,字体有两种,一种与“鲍尔写本”的字体相同,一种是中亚流行